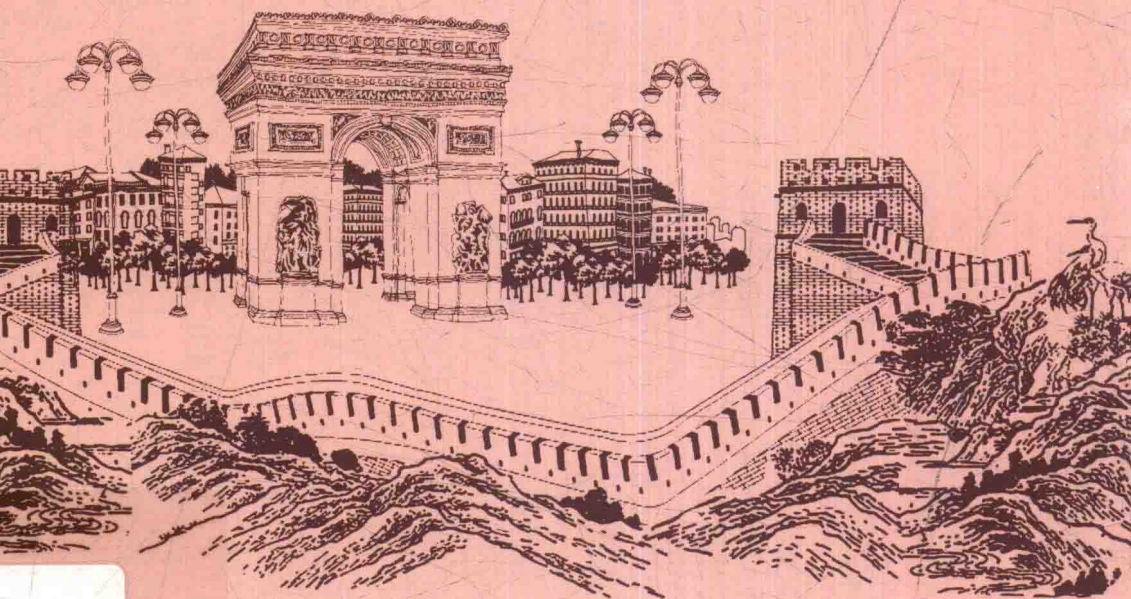


杨圣敏 蔡华 [法]多宗 (Dozon) 主编

目光的交汇

中法比人类学论文集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杨圣敏 蔡华 [法]多宗 (Dozon) 主编

目光的交汇

中法比人类学论文集



九州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目光的交汇：中法比人类学论文集 / 杨圣敏，蔡华，
(法) 多宗主编.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108-4595-6

I. ①目… II. ①杨… ②蔡… ③多… III. ①人类学—文集 IV. ①Q9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8294 号

目光的交汇——中法比人类学论文集

作 者	杨圣敏 蔡华 [法]多宗 主编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4.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595-6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蔡 华

在教育部“985工程”计划框架内，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与英、美、德等国家的学者进行了频繁的学术交流。作为这个交流系列的后续，2012年杨圣敏和丁宏两位教授计划组织一次与法国学者交流的国际研讨会。

2012年春，笔者为该研讨会撰写了给与会者的第一封集体函件，以下是该函的主要内容，现发于此，以为《序》。

中国的人类学家渴望引进不同国家同行建立的理论工具，以便分析我们的研究对象，一个多世纪以来这样的努力从未间断。但是我们认定，我们地球上今天的现状是：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科学”。

我们分享以下信念：人类学和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独立学科，自她们建立之日起就不仅赋予自己描写人类各种文化事实和社会事实的使命，而且具有从田野工作搜集的经验事实中抽取再现这些事实的规律性的概念之雄心。她们的终极目标在于努力建立一套自治的概念体系和

普遍理论假说，从而对一切文化和社会现象进行中肯的解释。

然而，众所周知，一个半世纪的奋斗之后，这两个学科远没有成功地建立一个可以用作标准模型的范式，目前提出的新的普遍理论假说也有待不断验证。更有甚者，各国学者使用的相同术语，甚至是最基础的那些概念，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甚至含义相去甚远。这样的形势要求我们对基本概念进行清理，以便明确地展现在这两个学科的理论化现状里，哪些是我们拥有的共同观点，哪些是我们的分歧。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为研讨会提议的主题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实体是可以认识的吗？如果我们认定社会科学至今没有一个为各个国家科学家共同体普遍接受的范式，那么是否存在一些我们都承认的基本概念？在哪些概念上我们存在着分歧？我们还建议对以下问题碰撞我们的思考：面对一个意识形态分歧、经济全球化和生态受到威胁的世界，我们的学科可以处理哪些主题以便为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做出贡献。

该文集为我们的研讨会最终产品，它是法国、比利时和中国学者第一次合作尝试的成果。我们将为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基本主题的概念化继续协同努力。我们坚信，由不同国家同行们完成的概念化的交叉将对理论基础的建立大有助益。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未来的研究将能够更加有效地交流。

（蔡华，北京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博导。

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国家认同 2011 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目 录

对人类学几种范式与定位的检验

- 科特迪瓦研究路径……………让-皮埃尔·多宗 1

当代民族志方法论

- 对 J. 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蔡 华 20

跨文化“现实”——作为人类学家之间对话的

- 前提条件……………皮埃尔-约瑟夫·罗郎 56

边疆：一个确定的概念还是一种文化观念？……………关 凯 86

人类学的振兴是通过宗教的振兴来实现的吗？

- 宗教，全球化和当代人类学……………里奥耐·奥巴迪亚 107

再论“主体民族志”

- 民族志形态的转换及其“自明性基础”的探求……………朱炳祥 131

现代记忆人类学……………尼可尔·拉皮耶尔 158

由表相观其本相：以凹凸镜像为隐喻……………王明珂 171

萨拉纳华人萨满教的知识及其传承方式……………皮埃尔·德雷阿日 185

神圣的凝望：藏族“村民影像”中的神山崇拜……………朱靖江 213

对人类学几种范式与定位的检验

——科特迪瓦研究路径

让-皮埃尔·多宗

从自省式的、与非洲学研究相关的人类学角度出发，我建议回到我在科特迪瓦期间的科研轨迹，对本学科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进行提问，也对包含一系列日益政治化且牵涉甚广的研究对象提出质疑。

科特迪瓦曾是法国殖民地，在这里我开始学习研究并成为人类学家。20世纪70年代期间，这个西非国家政局稳定且经济快速增长，成为非洲国家中的特例。科特迪瓦当时由乌弗埃-博瓦尼领导，他是名副其实的“国父”，一些处于独立初期的非洲国家领导人也这样称呼他，可见他的影响力早已超越国界。然而，这个国家之所以表面看起来有异于其他经历过的军事政变的非洲国家，并且不接受“欠发达国家”称号，是因为科特迪瓦与其他前法属殖民地不同，仍然与前宗主国保持着紧密关系。科境内大量法国企业的存在便是极佳证明，法国侨民数量则更具说服力，曾有五万法国侨民在此工作与生活，这个数

量是科宣布独立初期法国侨民人数的五倍之多。

除以上特征外，科特迪瓦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它是非洲少有的移民国家之一，是一个国际性的国家，因为其四分之一以上人口都来自于邻国，尤其是布基纳法索和马里。

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我将在后文展开论述，这也是科特迪瓦自世纪之交以来经历严重危机的核心问题，而且这个国家一直没有真正从中恢复。

因此我斗胆提出，我开始从事这份工作，是因为法国—科特迪瓦的“有利背景”，但更是因为我希望投身人类学。这门学科从“田野民族志之父”马林诺夫斯基开始，田野工作成为标准的康庄大道，成就了新的民族志书写方法。

我暂且不再赘述此方面的原因，转而开始介绍自己撰写民族志论文时期的学术环境。

一种人类学调查模式的巅峰与衰落

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而且此点已被多次说明^①，人类学这门学科，在整个 20 世纪都与欧洲殖民帝国发展有紧密联系，尤其在东南亚、大洋洲，以及更甚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地。人类学的构建，自身的科学范式的形成，是基于对非西方群体的系统性研究实现的，这些群体或被称为部落、土著，或被称为群族或民族。西方民族学家及民族

① 参见 G. 勒克莱尔：《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巴黎）法亚尔出版社 1972 年版。

志专家（因而以欧洲学者为主，但也会有专门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北美学者）长时间融入非西方群体，进行了大量田野工作。他们通常在一个特定地点，特别是村庄，运用著名的参与式观察，同时依赖一名或多名信息提供者的帮助。

数十年间，民族志研究都是如此，一个主导思想支配，赋予被研究群体的专有名称，即族称，代表了一个独特的整体，以全体论的方法，特别是从社会组织以及对世界观层面，就可以研究清楚。因此本学科领域内的著名专家，如师从马林诺夫斯基的英国人类学家，包括埃文斯－普里查德、弗雷德里克·纳德尔、埃德蒙·利奇、梅耶·弗提斯都完成了伟大的民族志，但通常是在殖民背景下，例如埃文斯－普里查德研究的苏丹努尔人，纳德尔研究的尼日利亚努佩人。正是锁定了社会组织方式的某些特定方面，例如亲缘制度或政治体系，民族志才孕育出比较民族学，这是一种能够在形形色色研究案例中建立起规律性和不变量的人类学。正如我们所知，所谓“人类统一性”或“人类思想统一性”是人类学的对立面，我认为若从更为科学角度出发，这个对立面的思想来源于18世纪和启蒙时代，追求建立自身术语与分类。乔治·默多克和列维－斯特劳斯在各自著作中都特别阐述过此类思想^①，但早在他们之前已有两位大家著作论述，即涂尔干与马塞尔·莫斯：这两位法国人类学奠基人虽然从未进行田野工作，但各自为了完成《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和《礼物》，皆对西方旅行者、传教士及殖民者进行了观察。

^① 参见 C·列维－斯特劳斯：《亲缘制度基本结构》，法国大学出版社 1949 年版；G. 默多克：《社会结构》，自由出版社 1949 年版。

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是民族志运用的两种科学范式。但或多或少，出于学术压力，尤其在非洲学领域，还需要增加更加动态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更加紧密地联系非西方群体具体状况，特别关注欧洲殖民地变化与冲突。20世纪50年代起，这种方法被乔治·巴朗迪耶在法国推广，^①又因为曼彻斯特学派的使用而在英国盛行，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人物为麦克斯·格拉克曼。^②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和英国正经历非洲学研究鼎盛时期，民族志研究得以蓬勃发展，且通常能够调和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方法，尤其是在亲缘制度领域，这正是因为其运用了旨在理解非洲传统与现代文化微妙且紧张关系的动态法。

另外，还需补充当时的学术背景。法国当时受共产主义影响，马克思主义是社会科学的最高科学范式之一。六七十年代期间，人类学，尤其是非洲学研究，通过民族志开始关注被研究民族的基础设施、生产与经营关系。

在此背景下，诞生了克罗德·梅拉索克斯的卓越论著《科特迪瓦古罗人经济人类学》（1963年）。步其后尘，亦受启发于路易·阿尔杜塞重读马克思的作品，一系列以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机器为理论基础的优秀论著问世，提出不同于以往用于多数大洋洲甚至非洲民族的分析方法。

在功能主义、结构主义与重新援引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曾有过不

① 参见 G·巴朗迪耶：《黑非洲当今社会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 1955 年版。

② 参见 M·格拉克曼：《非洲风俗与冲突》。（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 1963 年版。

少摩擦，但同样有不少值得注意的相互借鉴与结合。无论如何，它们之间确实有过很多争论，而法国人类学当时则脱颖而出，且被英国和北美人类学界称为“巴黎学派”。其吸引力主要在于或多或少参与了第三世界主义以及其他更加国际化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批评，这些流派更多来自经济圈，指出众多南半球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未能实现真正的独立和经济发展，因为它们比以前更加陷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圈套之中。

正是在这样丰富的学术与政治背景下，我完成了大学学业。当时的科特迪瓦不仅造就了梅拉索克斯的著作，还有大量卓越的民族志于此完成，也正是感觉踩着巨人的脚印，重走难以企及的先辈或成绩斐然的前辈们的道路，我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自己的研究。

当然，我不能够说我写的关于科特迪瓦贝特人（Bété）的“论著”达到了我所阅读论文的高度（无论如何是这份论文使我拿到了博士学位）。^①但我想强调的是，在论文尽力去阐释某种社会组织形式（一般是村落或家族类型），以及自殖民时期即开始的社会经济转变时，会以某种形式涉及其研究的民族对象。这是我特别坚持之处，而且我将扮演历史学家角色，在历史档案中深入探索，因为真正的贝特族在前殖民时代，既无专有名称（族称），也没有实际领地，在法国殖民之前“贝特”并无真实所指。相对的，我提出“贝特”这个名称与其代表的领土正是法国殖民带来的后果（法国殖民者确定其领土范围，使用且推广此名称）；而且，我指出民族性（民族意识）是一种近期现象，自

^①参见 J-P·多宗：《贝特族社会——科特迪瓦一个“民族”的历史》，（巴黎）卡尔塔拉出版社1985年版。

科特迪瓦独立后逐渐增强。换言之，我希望阐释民族并非如惯常所说来源于传统，而更多地来自某种意义的现代性，例如科特迪瓦作为殖民地，而后作为独立国家的自我建构方式。

事实上，类似结论已被先于我的研究者们找到，之后却不了了之。我应该说，不仅是先于我，而且是先于我们的研究者早已发现，因为其他法国的非洲学家在同一时间开始批判民族等级被人类学大量使用却无实际检验。因而，作品《民族之中心》出版，我在让-卢·安赛尔与 E.M. 伯克洛的指导下有幸参与编写，本书还收录了让·巴赞所著有关马里一个著名民族的《每个人的班巴拉》。^①

在此之后，我与我的同事让-皮埃尔·硕沃一起，跳出了贝特人范畴，进行了一项遵循史学史方法、研究科特迪瓦所有民族起源的系统工作。我们合作正是为了证明这些民族的产生绝大多数都是法国殖民的结果。我们指出，殖民国家就是一个民族志国家，它将其统治的科特迪瓦人民用民族学方法身份化、地图化、类别化。但我们同时也强调，殖民国家在各民族间建立起等级制度，提高一些的名望，贬低另一些的价值。而这个等级化过程在科特迪瓦独立之后仍继续在社会和政权建立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这种情况清楚地规避了民族志领域的人类学经典问题，而明显更加接近殖民与后殖民历史的政治问题。

但在继续这条途径的探讨之前，我们应该先指出，目前几乎不再有博士研究生或年轻学者（此现象在近十年前即开始出现）会去进行

^① 参见 J-L·赛尔和 E.M·伯克洛主编：《民族之中心——民族，部族制与国家》，（巴黎）马伯乐出版社 1985 年版。

一项这样的人类学工作（或许在其他国家仍然存在，但在法国几乎已经完全消失）。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因为正如之前指出的，民族志是最为重要的途径，它使人类学更加专业化，且支撑着我们提到的科学范式及功能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但是，难道我们不能认为，民族志之所以能够成为某种殖民关系的特点，不仅是因为其在欧洲殖民时代进行自我建构既成了调查方法，又成了研究对象，更是因为其或多或少继承了殖民政府建立的等级化社会？总而言之，民族志的弱化，或者说是消失，让位于其他研究对象，其研究通常基于“多地田野”调查，这也是目前很多在西方或非西方田野的年轻学者所使用的方法，这也似乎说明了人类学已经完全进入后殖民时代。

从民族志专著到越来越政治化的研究对象

为了继续我的民族志专著以及对法国殖民下科特迪瓦全部民族起源的研究，现在应该说明一下这些研究是如何导致我的科研工作逐渐滑向政治化的。

毋庸置疑，贝特族从人口数量角度看是极为重要的群体，占据西部林区部分土地，是科特迪瓦被法国殖民者歧视、烙印化的主要民族之一。在民族等级体系中，贝特人是原始的拜物教群体，也就是说，在殖民者眼里，贝特人地位最为低下，仅仅比那些拿起武器反抗殖民侵略的种族好一点。

在工作过程中，我发现了一种烙印化引起的悲情民族意识，作为这种烙印化感知的较强烈的表达。但这个特征亦是另一个复杂现象的结

果，如我们之前所说，经济增长使科特迪瓦成为特殊的国家，一个移民国家。确实，经济增长从殖民时代即开始，主要通过本地植物种植——咖啡与可可种植业在国内几乎全部森林地区发展，尤其是国家南部与西部，在原住民开发地的基础上进行。此时，为促进发展，殖民政府，尤其是西部与贝特地区统治者，开始鼓励异族劳动力移民落户，他们来自科特迪瓦其他地区，以北部与中部为多，也有来自诸如布基纳法索等邻国民众。

在一段时间内，发展皆较为顺利，直至本地群体，尤其是贝特人，开始不满于外乡人的大量出现，不论其是否为本国同胞。他们的不满与失望在独立后表现更加明显。当时正值“科特迪瓦奇迹”时期，即威望极高的乌弗埃-博瓦尼一党当政，这一期间咖啡与可可种植加速发展（科特迪瓦自此成为世界第一大可可生产国），大好形势吸引了更多移民，特别是西部与南部林区人口，对殖民时代形成的贝特族的关注则消失殆尽。

我在这个时期之前两年，确切地讲是 1970 年，刚刚开始科特迪瓦的首个田野工作，贝特族的一个主要城市经历了一次叛乱，其首领的目的即为贝特地区脱离国家管理，且以军事方式驱逐所有非本地侨民。但此次叛乱很快被当局政府完全镇压。

换言之，当我们认为科特迪瓦是有确实奇迹的例外国家，认为它通过大量城市基础建设和中产阶级发展加速了国家现代化时，这样一幅油画上其实也存在一片阴影；而且这片阴影主要来自“贝特族”，正是我希望完成民族志论文的对象。因此，贝特族的一切元素对我来说都极为重要，例如亲缘制度便是当时人类学的重点对象。我逐渐开始关心其他方面，开始去理解这个悲情民族意识（conscience

ethnique malheureuse), 去理解我称之为“土著性意识形态”(idéologie d'autochtonie) 导致的 1970 年叛乱, 且最终导致引发极大仇恨的流血反抗。

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像从坡顶滑了下去。那个地方曾经比较舒适, 我一来此地就立即开展了工作(研究条件和生存条件一直都很好), 却突然间变成了敏感地带。举个实例: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我跟洛朗·巴博走得很近(后来, 在 2000 年, 巴博成为科特迪瓦共和国的总统, 又在 2011 年竞选失败后拒绝下台), 而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已被囚禁在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的监狱里。

洛朗·巴博是一个贝特族侨民, 我对他出生的村庄非常熟悉。他本人曾经是历史学家, 是在我论文答辩不久前, 在巴黎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的一位同事, 也是乌弗埃-博瓦尼执政时期的著名左翼反对派人士。我们在科特迪瓦时经常交谈, 后来在法国也是, 上个世纪 80 年代受到科特迪瓦当权人士的威胁后他曾逃往法国避难。然而, 我们也有很深的分歧, 在分歧的表面下隐藏着很多其他问题。

分歧是由我的调研引起的。在我的那些有关法国殖民前贝特人村庄布居历史的调研中, 我证实了组成贝特人的族群(家族、村庄、部落)于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地域, 且很多时候来自离他们目前居住地很远的地方。这就符合这样一个事实, 即在殖民时期之前, 真正意义上的贝特民族并不存在。事实上, 当时只有不同的族群, 当然他们之间有着多重关联(通婚、贸易等), 但他们不一定有着共同的血统。然而, 洛朗·巴博说, 他之前得出了几乎相反的结论, 即使像之前所认为的那样, 在殖民时期之前没有一个贝特民族的存在, 隶属于这一民族的族群居民却业已有着共同的来源, 而且都是原住民, 也就是说, 按照

巴博的逻辑，比起任何定居于现今的科特迪瓦土地上的其他民族，这些贝特族居民更早地居住于此。^①

以上这点是我们之间的重要分歧，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甚至还曾引起过公众争论，然而它不曾给我带来太过严重的烦扰。但是这篇开始于十五年前的专题研究，从某些方面来看毫无新意，却把我拖进了前所未见的争论之中，知识与政治越来越严重地掺杂了起来。即使我有可能把贝特人的起源搞错，作为历史学家的巴博所坚持的立场显然并不仅仅是社会科学领域专业人士相互争论时所该采取的立场。他的立场在我看来，就是想要校正贝特人从殖民时期以来就有的负面形象，也就是把贝特人当作最早占领这片土地的民族，或者说几乎没有记忆的科特迪瓦世界的最早居民，以此来重新评价贝特人。

另外，在这一时期，科特迪瓦的形势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人们不再谈论“科特迪瓦奇迹”，或者说当人们提到这个，只是为了预测它的终结。

国家开支巨大，外债越积越多，作物（咖啡、可可）的出口价格降低，人民的不满情绪暴涨，尤其是针对乌弗埃-博瓦尼。他已经掌权三十年了。洛朗·巴博当时在法国，但是已经在准备回归政界，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即科特迪瓦人民阵线党（FPI）。当时正值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完成民族学专著后的一段时期以来，我开始对科特迪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先知预言现象——产生了兴趣。

在此我只能迅速地提及这一现象，但我想说的是它不仅涉及科特迪瓦，远甚于此：其他非洲国家、大洋洲及亚洲国家也在整个殖民

① 参见洛朗·巴博：《关于贝特人的足迹》，（阿比让）普西出版社 2002 年版。

时期经历过相似的现象。受到欧洲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传教士的启示，但同时也借鉴当地人的世界观和信仰崇拜，先知预言活动——这样命名可能更好——是土著居民对殖民地化的尤为显著的反抗。乔治·巴朗迪埃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将他们的先知预言活动称为“重拾创制权”，它们往往会采用政治运动的形式，比如说动员大量群众，培养新的自主的宗教感情，通过这一行为，甚至使殖民者的期望落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在特定背景下对先知预言现象的新诠释。这种现象在其他时期也涉及世界的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在危急时刻它也曾出现在这些地区的社会、道德和政治生活领域。

在科特迪瓦，这种现象出现于 20 世纪初，也就是法国殖民化的初期。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 20 世纪，持续不断地出现了先知性的人物，看上去就好像这个国家一直危机重重，即使是在“科特迪瓦奇迹”的伟大时期也不例外。^①自科特迪瓦独立以来，第一批先知主义者带着原有的神职人员和礼拜仪式投身基督教，后又出现了新一批先知。结果发现，对他们来说 20 世纪 80 年代比此前的一段时期更加适逢其时。所以，我对这新一轮的先知浪潮，尤其是对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特别受欢迎的人物十分感兴趣。这个人物，这名先知（和他所有的前辈一样，他也如此自称），名叫巴耶·古度，大体上是来自贝特人的世界（也是我比较熟知的世界）。与我了解的、他之前的先知相比，他是一个别出心裁的人。此前的先知们从殖民化初期就鼓吹“白人力量”和某种现代性，虽然他们的初衷是为了将这些特性融会贯通，并从中打

① J-P·多宗：《先知的事业——现代非洲政治与宗教》，（巴黎）塞伊出版社 1995 年版。